臺大歷史學報第 44 期
2009 年 12 月，頁 219-229

BIBLID1012-8514(2009)44p.219-229
2009.6.26 收稿，2009.11.5 通過刊登

§書評§

評述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xxiii+673 pp.

王　一　樵*

回顧近二十年來，西方學界不斷探究傳統中國出版文化，相關研究已成為歐美學界相當關注的課題之一。伴隨著「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等研究領域的開拓，研究者開始注意到書籍在地方上的流通，以及圍繞著出版產業的各種人文、經濟與生產活動。[1]因此，結合社會史與出版文化的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已漸形成一股趨勢，並引伸出許多相關議題。例如出版、印刷技術與其商業組織結構如何形塑傳統中國的書籍文化，以及出版業對於社會互動、思想與文藝的交流，乃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d96123001@ntu.edu.tw。

1 近年來討論此議題的西方學者眾多，並有多篇學術回顧，參見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6-7. 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在該文中詳細介紹書籍史、閱讀史的發展，回顧歐美學界對於中國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等相關研究，並論及日本與中國學界的研究成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梅爾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亦曾就相關議題，由出版商、出版文化、出版品來源，及讀者認同與其社會地位等角度，撰有專文。參見 Tobie Meyer-Fong,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3 (2007, Ann Arbor), pp. 787-817. 日本學界對此議題的討論，參見高津孝，〈米国の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 20 期（2005，東京），頁 471-481。國內則有涂豐恩對明清書籍史相關研究的回顧，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 20 卷第 1 期（2009，臺北），頁 181-2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對文化、宗教信仰、政治訊息與科學知識的傳播有何影響等等。最近的研究成果中，更可看出其研究取徑漸漸與區域研究及專業市鎮的研究方法相互結合。[2]其中，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教授有關此方面的研究，在歐美學界中可謂具有領導性的地位。她在 2007 年發表的新書《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即是一部專門討論清代至民國時期福建四堡地區出版業的研究專著。[3]由於本書篇幅規模宏大，以下筆者將擇要分述其內容與章節。

包筠雅自 1996 年發表第一篇有關四堡地區商業出版的論文至今，對該地區的研究已持續十多年。[4]作者曾在當地進行多次的實地調查，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材料。本書詳細討論近三世紀以來閩西四堡地區的書商社群、銷售網絡的具體發展情況，為其相關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在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該研究的問題意識，主要源自兩個方面：

其一，四堡位於今日閩西長汀、清流、寧化、連城四縣交界之地，是處於群山中的一個村鎮，為福建最貧困的地方之一（頁 35-38），先天地理位置並不有利，可說是「邊陲中的邊陲」。[5]相較於福建其他地區豐

2 例如賈晉珠（Lucille Chia）關於建陽出版業的相關研究，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本書書名之中譯《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筆者參考廈門大學劉永華關於本書之書評，並沿用劉氏對此書名的中譯。此外，劉氏針對本書的討論，主要是由西方書籍史之學術回顧、研究方法的介紹與討論著手，圍繞著相關議題進行研究著作之評述。參見劉永華，〈包筠雅《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評介〉，《歷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北京），頁 181-187。本文則試圖由中國坊刻史的研究、研究理論的討論、學術交流的現況，對本書進行介紹與評述。

4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Zou and Ma Family Businesses of Sibao, Fujia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1996, Pasadena), pp. 49-92; Cynthia J. Brokaw, “Reading the Best-sell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Sibao,”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84-231.

5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富的研究成果，四堡地區因地處偏遠，並不受重視。作者指出，多年來僅有陳支平與鄭振滿於 1988 年合著的論文〈清代閩西四堡族商研究〉，利用馬氏與鄒氏族譜等文獻材料，以「族商」的角度討論清代四堡族商的商業經營（頁 4）。[6] 1998 年以後，則有劉永華開始對閩西四堡地區的道教相關出版文獻進行一系列的研究。[7]至於四堡當地人對於出版業的相關紀錄，多半仍是未發表的手稿，或散見於地方文史刊物中。[8]然而從清代至民國初年，四堡地區的霧閣與馬屋兩地卻是清代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鄭振鐸（1898-1958）等人並將其與江西湓灣、漢口及北京，同列為清代四大出版中心。作者認為閩西四堡的書籍出版，對於瞭解中國商業出版的組織與體系，以及明清時期出版文化在社會與地理空間上的擴張而言，相當具有研究價值。

其二，以往中國出版文化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於出版品的本身，以及書籍在上層文人菁英間的流傳情況。因此，關於書籍如何透過商業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77.

6 陳支平、鄭振滿，〈清代閩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北京），頁 93-109。

7 劉永華（Yonghua Liu）的博士論文 "The World of Rituals: Masters of Ceremonies (*Lisheng*), Ancestral Cults, Community Compacts, and Local Temples in Late Imperial Sibao, Fujian"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hD. diss., 2004)，即以明清時期四堡地區為主，探討當地道教儀式、寺廟、禮生、祖先崇拜以及地方社會。劉氏的研究雖較注重道教信仰文化以及四堡地區的地方社會，但他與包筠雅在田野調查以及資料上的合作，使研究者得以由更多不同的視角觀察四堡地區。劉氏相關研究，參見劉永華，〈17 至 18 世紀閩西佃農的抗租、農村社會與鄉民文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北京），頁 139-150；〈明清時期閩西四堡的鄉約〉，《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 卷第 2 期（2003，廣州），頁 21-45；〈亦禮亦俗：晚清至民國閩西四堡禮生的初步分析〉，《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2 卷第 2 期（2004，廣州），頁 53-82；〈明中葉至民國時期華南地區的族田和鄉村社會：以閩西四堡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北京），頁 52-60。

8 例如馬嘉澍，〈馬屋雕版印刷業查閱資料〉，未刊稿；馬雲章，〈四堡印書業的興衰梗概〉，未刊稿；馬卡丹，〈四堡雕版印刷業初探〉，《福建文史》1993 年第 6 期（福州），頁 26-29；馬例文，〈閩西四堡坊刻的興衰及其原因〉，《福建學刊》1992 年第 4 期（福州），頁 56-60。相關書目轉引自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pp. 603-636.

臺灣藝術 期刊資料庫

經營而由城市地區進入內地鄉間村落，以及何種書籍透過這個管道進入庶民社會，相關技術如何傳播、出版業採取何種經營模式等等，仍然有待釐清，本書的研究正試圖回答上述的問題（頁 1-8）。

在章節安排上，本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閩西四堡地區的書籍出版，以及販書業的情況，敘述四堡地區最重要的兩個出版業中心——馬屋與霧閣，以及馬家與鄒家在當地所經營的重要書屋，並由此討論兩個宗族如何經營出版印刷業達數代之久。另外也分析該地區出版產業的營收情形、同業間的競爭，更廣泛擴及當地各村鎮間的出版市場規模、販售物流、經營模式，以及分店經營管理等議題。另一方面，作者亦由四堡書商的遠程販書與商業活動著手，分析書商們如何經營附近地區的分店，以及其銷售網路如何擴及華南諸多省份與偏遠地區（頁 235-267）。本書對四堡書商的經營策略亦有十分細緻的描述，例如書商們會使用較便宜的毛邊紙與較陳舊的刻版，以壓低製作成本，並且販售小開本、售價便宜的印刷品，這些都是使書籍暢銷的重要方式（頁 522）。

作者並以「四堡模式」的概念，在第六章討論四堡書商如何選擇他們的銷售路線與分店所在地。包氏認為形塑這些銷售路線模式的主要原則，可歸納成以下數點：首先，最重要的是這些銷售路線的可行性，書商得以經由這些路線順利到達各銷售點。其次，某些書商，例如鄒家、馬家的銷售路線，明確地反映明清客家移民的路線（頁 206-207）。鄒家與馬家擴展經營的地點，當地居民也大多使用客家方言。作者進而推論，四堡書商可能在經商地找到當地的親戚，而這或許有助於四堡書商獲得當地市場的相關訊息，以及可能得到住所、貨棧、經濟上的相關協助（頁 214-215）。第三個因素則與清代人口成長與經濟進步有關，例如鄒家、馬家選擇的分店設立地點，多半位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人口增加、市場成長的地區。此外，在以上因素構成的廣闊區域中，四堡書商也會針對自家獨特產品的需求以及競爭對手的活動作出相關評估之後，再選擇他們的市場（頁 206-20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合而論，四堡書商的成功，正由於版面安排的多樣化、低廉的價格，以及持續銷售暢銷書這幾個特色，符合廣大讀者的需求，進而掌握內地與農村地區的市場。作者並在第七章詳細討論四堡書商與各地分店之間的互動，並分析四堡書商為何在進入民國時期日趨沒落。作者指出，四堡書商在各地建立的商業網絡，不僅顯示其經營的成功，也反映出四堡商業活動的日趨複雜與精密。但各處分店書肆的林立，同時帶來管理上的困難。許多分店開始自行出版刊印書籍，造成同業之間的競爭。其次，隨著晚清至民國以來稅制的變化，四堡書商必須開始繳納商業稅，經營上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促使四堡書商退出歷史的舞臺（頁 260-267）。

作者認為四堡書商的成功之道，不僅反映清代出版業向下層社會滲透的情形，也呈現出版業對閱讀文化的影響（頁 514-529）。雖然就版本學而言，四堡出版品絕非精品，錯漏與誤字甚多，然而分析四堡坊出版品的廣大讀者，能讓我們對清代民眾閱讀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更深的理解。此外，第八章中，作者針對閩西等地的書商如何呈現自我形象進行分析，討論馬家、鄒家等書商融合商賈與儒者兼具的地方士紳特殊形象（頁 268-293）。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由四堡出版業的各類出版品展開後續討論。作者廣泛討論四堡出版品的多樣性，包括科舉考試用書、啟蒙讀本、詩集、儒家經典等等；或如日用類書、醫書、善書、禮儀書籍、命理風水用書，以及娛樂性的出版品，如小說、戲曲、歌譜、畫譜等，也都在出版品項之中（頁 410-475）。但大體而言，四堡地區的出版業並不重視出版翻刻珍本古籍，強調的是銷售與商業經營。

除出版品的種類外，作者很重視四堡地區出版品與讀者們的互動關係，例如品質評價、庶民文化的形塑、讀者社群等，並進一步將四堡地區的出版業，置於清代出版文化的脈絡中進行分析。作者在討論四堡書商與清代出版文化時，曾對其讀者群進行分析。她指出，雖然就書價而言，一般人皆能輕易取得四堡的出版品，然其顧客層仍集中在三個不同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階層：第一，低階官員與地方文人；第二，各類學生、商人、工匠，以及村落中某些具有專業技藝的人士（例如專門於村落中操持禮儀活動的禮生）；第三，能夠讀寫的農民，或是粗識文字者，以及為了教育與娛樂目的而閱讀的各類讀者（頁 511-518）。

作者認為透過這些讀者群，可以知道四堡書商在形塑、傳播、穩定與保留庶民通俗文化上扮演特殊的角色。雖然他們只是增加並擴大相關出版物的數量，簡單地進行再編輯，或是擴充早期的版本內容，但是如果沒有四堡書商，這些書籍將無法進入內地以及華南數省邊界間的偏遠地區。此外，由於四堡書商的經營策略使然，加之資源有限，使得他們不得不採取較為保守的銷售、選書與出版方向，只選擇保證暢銷的書籍出版，這種作法長期、穩定地提供了許多通俗文化文本（頁 529-533）。作者並將四堡書商與西方浪漫主義時期的書商加以比較，指出兩者雖然情況相異，然而四堡書商對庶民通俗文化的形塑，也有類似的作用（頁 532）。

最後一章，包氏將四堡與當時華南三個出版相同類型出版品的重要中心——江西澄灣鎮、四川岳池、廣東馬岡進行比較；並指出同類型的出版業，可以在組織結構上呈現不同的樣貌。作者認為，相較於其他地區的經營模式，四堡的特色在於建立了一個以家庭手工產業為主要形式的出版事業，而且依賴宗族來維繫其商業運作。此外，在銷售分配上，四堡出版商的銷售路線，受到客家移民路徑與模式的影響（頁 536-548）。最後，本書並就整個清代出版文化與政治權力、社會狀況、識字能力等，進行綜合性的比較分析。綜合而論，包筠雅的研究不單只是利用文獻，也充分配合田野調查，如與廈門大學劉永華等學者在閩西四堡地區合作進行多次的田野訪查，兩相配合，從而得到相當的成果（頁 60）。

本書涉及四堡地區出版業各方面的討論，相關分析兼具田野調查之實證與理論方法上的思索論證，時間跨度則由清代至民國時期。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擬由三方面來對本書進行討論與評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研究理論的困境與克服

本書雖然以閩西四堡地區作為研究主題，但其研究取徑則反映「書籍史」、「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發展歷程。此一研究趨勢，可追溯至法國年鑑學派早期關於閱讀史、書籍史的研究所形成的影響。[9] 1950年代，法國學者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合著的《印刷書的誕生》（*L'Apparition du livre*），首先提出書籍史的研究取向。[10]自此之後，相關議題便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現，蔚為一時潮流，近年來即可見到學界開始將出版文化史與社會史、思想史、城市史與區域研究結合在一起，呈現有別於以往的研究成果。同時，學界也開始對相關成果有所反思，並提出不同的研究取徑與問題意識。[11]

---

9 Cynthia J.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6-7.

10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中譯版：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關於馬爾坦與夏提埃（Roger Chartier）對於書籍史、閱讀史、書寫文化史相關研究的回顧與評述，以及兩人在研究材料、概念工具與研究取徑上的比較分析，秦曼儀曾撰有專文加以討論，參見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臺北），頁 257-314。

11 例如周啟榮（Kai-wing Chow）在回顧歷來中國印刷出版文化相關研究時，曾具體指出前人的研究多有障礙與誤解之處。周氏認為這些障礙集中在幾個方面：首先，早期漢學家的研究取徑，基本上造成一定誤解。其次，過度依賴西方方法論與詞語，使研究出現障礙與誤解。第三，歐洲中心論、歷史主義、現代性敘述造成的研究困境。周氏的質疑與反思中，同時也呈現出相關研究所面臨的困境。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8. 此外，關於將西方書籍史研究取徑用於中國相關研究議題的適用與侷限性問題，所進行的反思與探討，包筠雅也曾在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書的序言中述及。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54. 除周啟榮與包筠雅的討論外，法國學者夏提埃亦曾撰文加以討論。Roger Chartier, "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1996, Pasadena), pp. 1-9.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就本書的議題而言，早期的研究認為中國的印刷事業並非以營利為主要動機，道德責任與使命感才是促成印刷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2]有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的活字印刷與出版機構，僅限為政府與官方所用。[13]相較之下，作者在討論四堡書商時，具體地提出反思，由不同的角度討論地方坊刻的發展及其商業活動。包氏利用田野調查，並配合對閩西社會、宗族、客家移民、交易網絡、書商經營策略的相關背景研究，以及運用豐富的文獻資料，建立了一個詳細的知識框架，克服前人的研究困境。本書綜合大量史料，包括祖譜、帳簿、四堡各類的出版品、作者實地查訪所得的調查與攝影紀錄，甚至是家族傳說，詳細回溯地方坊刻之發展歷程，使得原本在中國印刷史、版本目錄學中幾近被忽略、知之甚少的四堡刻書業，得以為世人所知。此書更結合四堡書商銷售路線與客家移民，綜合地討論。透過作者的研究，使得中國書籍史的研究得以更廣泛地將視野擴展至書商銷售、分店經營、市場選擇的層面，此為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二）坊刻研究的深化與各地出版模式的比較研究

包筠雅曾在書中表示，希望此書能成為中國書籍社會史領域中的基本參考文獻（頁 32），然而，誠如其所言，相關的研究領域仍在初創階段，實有待學界努力耕耘。版本目錄與書目文獻學者沈津亦曾表示，中國近代以來的坊刻本研究，一直處於薄弱的環節。[14]在此書之前，無論

12 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功能〉，《漢學研究》第 8 卷第 2 期（1990，臺北），頁 246-247。

13 邱澎生指出，相關討論或由道德使命感立論，認為中國印刷事業與西方社會中營利取向的印刷事業有所不同；又或者主張中國印刷與出版動機，僅為官方與統治者所利用。邱氏認為這些討論並不符合明代晚期以來中國出版活動發展的實情，也忽略了十六世紀以來民間營利性出版事業的發展。他指出十六世紀以後，坊刻本確實呈現出營利的出版動機。邱澎生，〈明代蘇州營利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1992 年第 2 期（香港），頁 139-159。

14 沈津並舉黃永年（1925-2007）所撰〈介紹一個世紀前的童蒙讀物〉為例，指出關於清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是版本學、文獻學、印刷史、出版史的專著，都對四堡著墨甚少。沈津認為在本書的基礎上，顯然有許多主題可以深入討論。[15]

作者雖在本書中特立一章，討論清代四堡地區之外的地方坊刻，但細究清代各地坊刻的出版，則能發現本書在區域比較研究上仍有再開發的空間。例如江浙一帶的坊刻，亦相當值得注意。蘇州的印刷便在清代發展迅速，成為全國最有名的印刷地區之一。[16]掃葉山房就是蘇州印刷歷史悠久的書坊之一，創設於明代後期，發展至光緒年間，還在上海、漢口等處開設分號。[17]杭州的印刷作坊亦有文寶齋、景文齋等；[18]浙江的紹興、寧波、餘姚、慈溪、嘉興，與江蘇的揚州、鎮江、常州等地，也有一定數量的印刷作坊。[19]

除江浙以外，江西地區的南昌、婺源、金溪等地，也有許多重要的出版中心。特別是金溪，清代正是金溪書坊成長發展的關鍵時期，當地著名的金溪兩儀堂，即在江西吉安、澉灣等地設有分店。至於金溪當地的周氏家族，亦在家鄉與遷居地南京兩地，設立諸多書坊。相較於四堡書商，周氏書坊的經營模式是否反映出另一種地方坊刻銷售網絡的經營

末南京李光明莊坊刻的研究，自黃氏此文之後，幾乎沒有一篇專門介紹的文章，顯然目前此類研究仍然相當有限。參見沈津，〈李光明莊刻的書〉，參見作者網頁：書叢老蠹魚的 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8sqw.html，2009 年 3 月 10 日檢索）。黃永年，〈介紹一個世紀前的童蒙讀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4 期（西安），頁 164-165。

15 沈津以四堡為例，討論清末李光明莊坊刻的發展，點出關於清末各地區坊刻的不同面向。沈津，〈李光明莊刻的書〉，參見作者網頁：書叢老蠹魚的 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8sqw.html，2009 年 3 月 10 日檢索）。

16 甘蘭經，〈略談蘇州古代的出版事業〉，《蘇州教育學院學報》1986 年第 3 期（蘇州），頁 61-65。

17 謝灼華、查啟森、趙燕群編著，《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 221-222；黃鎮偉，《坊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55-56。

18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6-157。

19 例如揚州文富堂、寧波玉山房等，參見柯玲，《民俗視野中的清代揚州俗文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230-231；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頁 171。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策略，值得研究者探索與比較。[20]

另外，清代湖南長沙南陽街書市與湖南出版業的例子，也呈現出清代至民國初年各地坊刻的發展，以及當地經營上的特色。[21]而清代四川出版業由成都幫、岳池幫、綿竹幫、重慶幫所組成的「四大刻書幫」，各有其經營特色，皆有待更深入的研究。[22]目前包筠雅已開始對四川岳池地區進行相關調查研究，其研究成果令人期待。[23]筆者以為，如能進一步比較各地坊刻的經營模式，以及各自的銷售策略，想必會深化相關研究，進而呈現出清代商業出版文化的諸多面向。

（三）區域研究展望：跨國研究計畫的前景

由前述可知，本書的研究過程中，得益於跨國合作的田野考察計畫頗多。這類跨國研究計畫，近年來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除田野調查的合作外，網際網路上也開始有相關研究社群的成立，亦取得新的進展。例如 Hilde De Weerdt、Joe Dennis 等學者，於 2005 年在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組成「中國早期出版文化研究」（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工作坊，開始利用群體研究的力量，針對此一議題進行研究。[24]

國內亦有學者設立同類型的網路論壇「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論

20 文革紅，〈清代江西的小說刊刻業〉，《時代文學（下半月）》2008 年第 4 期（濟南），頁 95。

21 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長沙文化局編，《湘城文華錄：建國後長沙文化史料專輯》，上冊（長沙：長沙市文化局、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97），頁 99。

22 王綱，〈清代四川的印書業〉，《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北京），頁 62-70。

23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 20 卷第 1 期，頁 196。參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包筠雅博士到岳池縣考察民俗〉，廣安方志網（http://www.gafz.gov.cn/News_View.asp?NewsID=290，2009 年 6 月 20 日檢索）。

24 Hilde De Weerdt 現任教於牛津大學，該工作坊網站的訊息與相關連結已移除。關於該工作坊相關活動的介紹，請參見“Spring 2005 Postdoctoral Workshop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rint Culture in China,” *Fairbank Center News* 9（《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通訊》）(2005, Cambridge, Mass.), p. 5.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壇」，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與青年學子一個跨領域的平臺，進行學術交流。該論壇希望經由跨領域的視角，廣泛討論晚清以來報刊出版中呈現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25]透過網路平臺的交流，進而分享學術成果。在本書研究內容的呈現上，我們也能看到此一趨勢。

本書除提供許多表格以及參考書目之外，另有九個相關附錄表格（分成 D、E、F、G 四個類別）放置在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網站上，提供有進一步研究需要的讀者下載。[26]這種獨特的內容呈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以往學術出版品的形式，使得更多的研究者得以更便利地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綜合而論，本書無論在研究成果及獨特的呈現方式上，都為此研究領域奠定了重要的里程碑。

（責任編輯：周馥儀　校對：吳喬同　陳冠辰）

25 該論壇現有成員包括十多名海內外學者，以及歐美、日本、大陸地區博碩士生多人。其計畫宗旨即強調由跨科際的研究著手，積極開拓晚清報刊的研究領域，並嘗試建構出報刊、媒體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以進一步掌握晚清在新興的資訊生產與流通下，所再現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該研究計畫之詳細內容，可參見「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室」首頁（http://printculture.nccu.edu.tw/，2009 年 1 月 6 日檢索）；該論壇之研究討論區網址為 http://blog.sina.com.tw/late_qing/（2009 年 1 月 6 日檢索）。

26 D、E、F、G 四個表格附錄的下載位置，參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網站（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publications/pubs.htm，2009 年 6 月 20 日檢索）。Susan Naquin（韓書瑞）在本書書評中對此有簡短的討論。參見 Susan Naquin, "Book Review of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 (2008, Cambridge, Mass.), pp. 211-212.

臺灣本土學術期刊資料庫